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第三只眼看延安

任文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第三只眼看延安

任文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4N06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只眼看延安 / 任文主编.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 6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ISBN 978 - 7 - 5613 - 7708 - 6

I. ①第… II. ①任… III. ①延安市—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4. 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8491 号

第三只眼看延安

任 文 主 编

责任编辑 巩亚男 杨 珂

责任校对 梁 菲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25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7708 - 6

定 价 3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冯晓立	傅功振		
主 编	任 文			
编 委	薛义忠	石 杰	梁向阳	孙国林
	朱鸿召	张军锋	梁星亮	姬乃军
	刘卫平	田 刚	陈答才	王晓荣
	刘东风	冯晓立	傅功振	
参编人员	王 耀	王晓飞	王慧子	邓 微
	仝 蕾	巩亚男	庄婧卿	刘存龙
	张 双	赵虹波	雷亚妮	

编辑说明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是一套以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以及相关原始档案并配以历史图片为基本内容的史料集成。它试图以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或者后代的讲述、回忆，来还原历史真相，呈现延安十三年的辉煌，从而改善当代人对“符号化”延安的僵化认识，再现一个本色、真实的延安。入选文章均来自已出版的图书、杂志、报纸，酌量选录地方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机构等征研的资料。

丛书所选文章注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尤重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梳理。丛书内容虽以回忆、口述等形式呈现，但其较强的故事性、可读性，有益于对当代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与意义。

丛书共 17 种 21 册。内容包括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重要的档案材料及代表性研究文章。口述实录、访谈录与回忆录前均设置了对口述人或回忆人的简要介绍，并突出介绍口述人或回忆人在延安的工作或生活经历。

所选文章中，因个人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以及可能附加的主观因素等，讲述人或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不一定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且不同的亲历者对同一事件的细节叙述也常稍有出入，这一方面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复杂

性、多元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应该是“人的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写法”或“说法”，更不存在“唯一性”，这样才能更趋历史“真相”。为尊重原作，编者收入时未强求统一，多以“编者注”提醒读者注意。

入选文章写作时间跨度从上世纪 30 年代到本世纪初，每篇文章自有其文字风格和时代的语言习惯，收入本丛书时，除特殊情况外，皆尊重原文，不做改动；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多未做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错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以修正。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等，依据现有出版规范做了统一处理。除特殊情况外，原文篇后注或行文注统一移作脚注，文献著录稍加统一。

由于我们工作经验不足，或翻检资料有限，或水平、认识有限，其中可能存在讹误或差错，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作为一套大型汇编丛书，涉及文字与图片等著作权联系方面的工作难度很大，我们进行了多方努力和联系，但仍有部分作者信息不明或原工作、生活地址变动而无法联系，希望版权人或版权继承人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奉稿酬与样书。

谨以“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的出版，向革命先辈致敬！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编委会

2014 年 3 月

抗战期间外国人及民主人士 对陕甘宁边区的观察（代前言）

张 玲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进行的一场全国全民性的战争。在此过程中，全国各族爱国人民、海外侨胞及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都对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而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这块西北的“禁地”，也开始和更大范围的世界接触，逐渐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但是不同的人对边区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将边区视为圣地，将其赞美为东方的自由乐土，还有一些人贬斥边区是封建的割据势力，把边区批评得一无是处。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重要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共最高领导层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抗战期间在外国人、海外华人以及民主人士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观察者眼中的中共领袖毛泽东

长征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体系。到达延安后，这一体系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加强，特别是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的权威地位就再也无人能撼动了。抗战爆发后，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延安的这些政治军事人物领导了敌后的抗战，而毛泽东也就成了外国人和民主人士观察陕甘宁边区的首选对象。

抗战时期毛泽东在边区内的权威是绝对的。他的画像、题字挂在各个公众场所，包括所有的工厂学校，而“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也成为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①“他

^①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66页。

告诉他们中国在走向何方，他怎样把他们带到那里去，当他们到达那里时必须做些什么。没有人对毛泽东提出过异议，他的精神力量是神圣的。……特别是他的意志，他个人的意志，和坚持不懈地要看到这意志的实施，在20世纪，也许除了列宁之外，是最令人生畏的了。”^①

在这些外来观察者眼中，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显然是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事实上，毛泽东不但能够把全党思想统一到抗战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上来，而且领导全党和边区人民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一个政治作风民主、经济有很大发展、军民生活状态紧张而有序的新型社会。

陕甘宁边区的思想政治作风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敌后抗日中心的延安，思想政治工作同样是至高无上的。“延安，置于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像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②思想工作的重要性的首先表现在根据地的功能上，“根据地”的作用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往战争前线供应武器、后勤、给养和支持的安全之地。相对于提供武器、给养这些物质上的，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更重视思想的作用，“延安根据地运往前线的物资等于零，所有的战区都是自我维持。延安输出的是人，即能够传播思想的干部”^③。所以延安的主要功能是使这些干部在根据地不断地接受教育，使他们学会用新的方法思考问题，以利于更好地传播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也便于进一步团结各方力量投入抗日战争的事业当中。

① [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205页。

② [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页。

③ [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199页。

反对党八股是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中共在政治上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方面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另一方面也给党内的民主创造了某种环境。边区自由、务实的政治氛围不但得到了海外华人和国内民主人士的赞扬，而且也得到了外国人的认同，白修德在其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述：“在延安的那几周，充满了欢声笑语，令人惬意。……友谊的酒杯觥觥交错，朱德和周恩来可以不经报告，安步当车，像朋友那样到美国观察站走访，一聊天就消磨几个小时。……这是一段亲善的时期——人们豁达开朗，热情信任。……那时他们之间相互信任，渴望与我们交朋友却是真实的。”^①可见，当时的延安是一种平等自由的政治氛围，人们的心态也比较豁达，对友军也抱以非常友好的态度。

在整个抗战期间，虽然延安的中共非常重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此时的边区仍然保持一种自由、宽松的政治氛围。通过紧抓思想工作，使军民上下团结一致进行抗战；创造宽松、良好的政治氛围，也从另一个方面促使人们以更高的积极性投入抗战中。

边区的经济建设活动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一隅，地理、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当地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与重庆相比，这里也没有广大的经济腹地。可以说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环境是相当差的。但是边区人民并没有坐以待毙，在中共的领导下，边区的经济建设搞得却是有声有色。

在农业建设上，边区政府首先解决了土地问题。“苏区时代已经分配的土地，现在仍旧维持现状，而在公平的合理的融通办法中，使原来地主也能够满足。”^②对土地所有权还未确定的土地，政府颁布了人民土地所有权条例加以解决，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地主与农民间因土地问题而产生的摩擦和斗争。

① [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

② 舒湮：《边区实录》，国际书店1941年版，第9页。

边区经济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除了公营经济外，各家各户以至于政府机关、学校都要进行生产活动，这也形成了边区独特的一种经济形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手工业中的纺织业：“在边区，无论走到哪里，政府机关、学校、商店、农田、窑洞，到处都有粗糙的木制纺线机。几乎是每一个人，高级的低级的，都把若干剩余精力用在纺棉线或毛线上。”^①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兴起后，这种手工纺织业更加兴盛。边区从上到下，每个月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制订纺织计划，然后根据计划大力生产。当然这种计划的制订不是政府强制的，不过在那样一种全民皆生产的氛围中，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到了这种紧张的生产活动中。总体而言，由于缺乏机械的供给，边区的手工业生产是相当落后的，没有大规模的工厂来生产人民必需的一些生活用品。但这种全民生产的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边区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在相持阶段逐渐把注意力从抗战转向对内反共之后，边区的经济陷入了极端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边区军民进行生产运动是必要的，其取得的效果也是积极而明显的，边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度过了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还表现在商业、工矿业（如采煤、石油）、畜牧业、交通业等方面。而普通人民也逐步摆脱了贫穷的状态，他们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财产。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有这样的记述：“到处是新建筑，我和御秋去访问，‘你们这屋是自己筑的吗？’答：‘是。’‘有没有公家贷款给你们或是补助你们？’答：‘没有。’看各家的建筑，各式各样，可以证明这确是他们自己的建筑。”^②

整个抗战期间边区的财政虽然很困难，但是在中共领导下，军民上下却以高度的热情投入边区的经济建设运动中，在农、工、商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边区经济困难，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敌后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① 孙承佩：《孙承佩文集》，学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

② 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性——和美军的青年尉官及士官坐在一起，他们对她们谈他们美国的故乡和家庭。马厩似的礼堂里演的戏剧招引了成群的兴高采烈的观众；特别是在那些农村气味的星期六晚会上，人人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大学和工厂的男女，八路军的军官和士兵，当然还有晚会必到的美国人也参加极度紧张的秧歌舞、华尔兹舞和狐步舞。他们想到重庆统治区里新生活运动的严禁跳舞和令人窒闷的死气沉沉的情形时候就说：‘哎呀，这边跟那边多么不一样呀！’”^①这种活跃的气氛给人们的精神带来了愉悦，也使这些外来观察者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整个抗战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通过艰苦的斗争，不断地壮大起来，在抗战即将胜利时，面对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抉择，国共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而在一些外来观察者的眼中，国共关系的走向却早已经确定了。驻华武官谢伟思 1944 年 10 月在备忘录里写道：“共产党已建立了既广且深的群众支持……除非国民党在政治经济的改革上和共产党有同样的成就，并证明自己能争取人民的领导地位……”^②而外交官台维斯也说：“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不能长期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命运……”^③而陈嘉庚更是在访问延安之后断言：“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④通过这些外国人和民主人士对陕甘宁边区的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但有能力领导抗日战争，而且在此过程中还不断地壮大，并为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选自《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内容有删节）

① [美] G.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希望书店 1946 年版，第 213 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96 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96 页。

④ 《回忆陈嘉庚》，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 页。

CONTENTS

第三只看延安 目录

1 抗战期间外国人及民主人士对陕甘宁边区的观察（代前言） 张 玲

民主人士、华侨领袖看延安

002 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 俞颂华

010 访问延安 梁漱溟

023 参拜延安圣地 江文汉

042 延安考察记 陈嘉庚

065 1942 年延安参观日记 刘菊初

104 延安标准化生活 赵超构

123 延安归来 黄炎培

外国记者、国际友人看延安

158 在红色的堡垒中 [美] 尼姆·威尔斯

179 一位德国女摄影家眼中的延安 [中] 耶娃·萧

187 进入红色中国 [美] 哈里森·福尔曼

197 新中国的胚胎 [中]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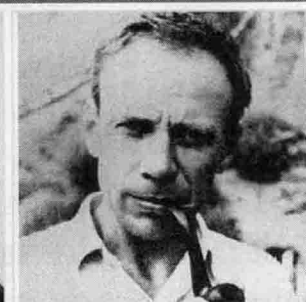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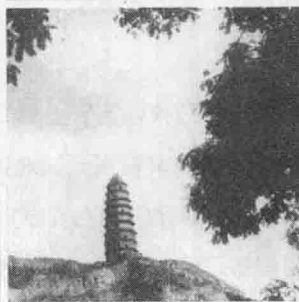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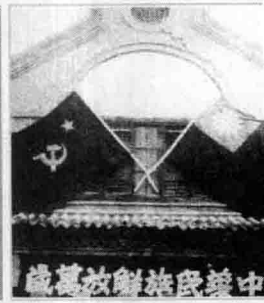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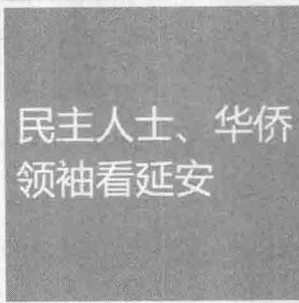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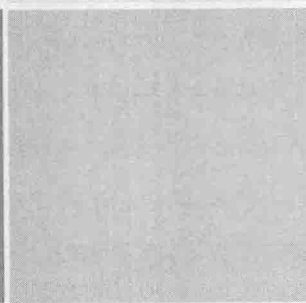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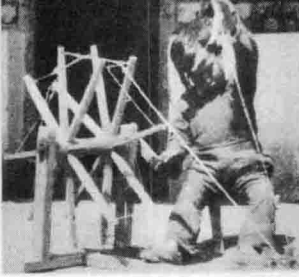
230 对陕北的印象 [美] 约翰·S. 谢伟思

240 延安的政治 [美] 白修德 贾安娜

史实与考辨

256 几位国民党将领在陕甘宁边区 梁星亮

265 延安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刘立军



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

俞颂华

俞颂华（1893—1947），名珪，又名庆尧，笔名澹庐，江苏太仓人。曾是蜚声中国新闻界的著名报人，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位名人。一生尽瘁报业，“以新闻事业为唯一终身职志”，曾主编过《时事新报》之《学灯》副刊、《解放与改造》、《申报月刊》（后改为周刊）、《光明报》等。除了编辑过多种报刊外，也进行过多次出色的采访活动，其中有两次重要采访值得载入新闻史册。一次是1920年，和瞿秋白、李仲武由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派赴莫斯科采访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一战后的德国；另一次是1937年4月，与孙恩霖以《申报》记者名义，访问延安。本文所写便是这后一次的所见所闻。

本报记者孙恩霖君和我，曾于上月9日同作西安的旅行。我们乘飞机到西安。到了西安后，因为大家有兴到陕北去看看，所以后来又由西安到肤施（即延安）去走了一趟。从陕北回到西安以后，我们遂由陇海路回来，在临潼、华阴、洛阳、开封都各逗留一天，游览名胜。由陇海路到了徐州，我们乃改乘平沪通车回到上海，来回计共十六天。

一、由上海到西安

4月9日的黎明，孙恩霖君来到我寓中与我一同到龙华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场。我们的行李带得很少，到了机场，行李磅过之后，我们即上飞机。我个人旅行的次数和所经过的地方虽是很多，但乘飞机旅行，说来惭愧，却还是初次。初次乘飞机，情绪上自然不免有些紧张，总以为比乘舟车危险，至少是不很舒

服的。但是飞机上升之后，始知十分稳快，且因天气甚好，所以大家均极感舒适，反觉当初所有的紧张情绪，完全是庸人自扰。

那天上午6时半由上海飞机场起飞，过苏州和无锡的时候，两地城内城外的山水、田园、房屋、高塔都历历在目。过了无锡看见机下有一片“雾海”。我昔游天目山和泰山都想在高处看看云海，但都没有看到。不意云海究竟与我有缘，在这次飞机上居然看到了。

7时45分我们到了首都。中山陵和军校等处，都在机上看得很清楚。从上海到南京机上乘客除我们二人外只有美国旅行家二人。到了南京乘客就多了。飞机在南京机场加了许多汽油后于8时再飞，10时40分到达郑州，在郑州又有许多乘客上下，飞机又加了汽油，于11时10分再飞。起飞的时候乘客竟然满座。上来的乘客军官及其眷属居多。我们一路西飞，看见下面尽是黄土，碧绿的田畴，虽亦不少，可是不如江南那样“佳禾葱茏，弥望皆碧”了。到了下午1时20分，我们便到达了目的地西安。到达的时候，我们表上已2点多钟，当初疑心飞机未及准时到达。但到后来才明白上海与西安的时间相差三刻钟，飞机却并未迟到。

我们在西安飞机场下机以后，看见行营顾主任祝同，第二厅厅长叶元龙，第二组组长刘英士都在场，他们正在送重庆行营办公厅厅长韩德勤上机赴渝，所以得在机场不期而遇，叶、刘二君都是我的老友，如今不约而晤，大家都是喜出望外。他们与我谈了片刻，送了韩君，便以他们的车送我们到西安最摩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

西安有宽阔的街道，壮丽的鼓楼与钟楼。但未经石子铺砌的土道却亦不少。大街两旁的市房商店的建筑，颇有北平市之市风。我们于4月9日下午到了以后，以一天半的工夫访友，并参观西北考古会，该会有古物陈列室，室内都是发掘出来的古器和碑版，其中有三代时古器，尤为名贵。11日适值星期日，西京日报的李亦人君是我中大商学院的同学，他于上午来访，并伴孙恩霖君与我作竟日之游。是日天朗气清，我们游了终南山、大雁塔、武家坡、碑林、东狱庙等处。翌日大风，尘沙蔽日，我们在西京招待所，虽闭了窗户，但黄沙仍

由窗户之隙飞入，地板上、桌上、床上都积了一层一层的细沙。这样的大风，据当地的人说，为五六十年来所未有。数十年未有的大风扬沙，不期我们到了西安就碰着，真是一桩巧事。

二、由西安到陕北

西北亢旱，水利的设施，极切民生的需要。孙君和我到了西安本想去视察泾渭渠。不过因为到了西安即在《西京日报》看到中央社记者视察了泾渭渠后所发表的详细的记述，故我们后来就决定不去视察泾渭渠，而要往陕北一游，看看那边的情形究竟怎样。就在大风的那天（即12日）我们去打听到陕北的路程和交通工具。打听的结果，知道13日有运粮的大汽车到肤施可以搭客。不过路很难走，来回需四五天之谱。我们不怕辛苦，决计搭粮食车去。

不巧得很，12日晚下雨，一直到13日上午雨不停。西北的汽车公路大都是土道，道上都是黏土，下了雨，车轮便极易陷入泥中，不能动弹。故一到雨天，交通上便有问题。况且由西安到肤施汽车须爬山越岭，更非天晴不能开驶汽车。故是日运粮的汽车不能出发。13日晚雨点停止，又发了些风。到了14日上午，道路上的积水已于隔夜被风吹干，运粮的汽车可以开行了，我们便搭了它北上。

我们过了渭河泾河先到三原，在三原停了片刻，我们看见市街上有“三原是渭北民运中心”等旧标语，并且还碰着北平某大学的春假旅行团在那里候车赴陕北。过了三原便有许多山路。经过了很长的山路，才到耀县，我们便在那里的旅馆歇宿。耀县的旅馆异常简陋，比较西京招待所真有天渊之别。第二天（15日）黎明，再由耀县出发。汽车爬山过岭，经过同官、宜君、中部直达洛川。车行甚为颠簸，而一路所见的风景也很特殊。往往汽车盘旋盘旋地爬上了山顶，山顶上却是一片平地，走了一段路，才看见此山与彼山间有极深的山谷，到了后来，绕了许多弯子，汽车又慢慢地下坡。一路人烟稀少，荒地很多。黄沙随风扑面，好鸟在极稀的树林中叫唤，有时更在一片黄土上看见几株红的桃花，